

译介学的创立、贡献与对外传播

——兼评《译介学:概念与应用》

耿纪永¹, 刘朋朋²

(1.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241; 2.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 译介学最初是由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谢天振系统创建的翻译研究理论体系, 是比较文学学科和翻译学学科的交叉成果。谢天振对译介学的理论建构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大讨论这一时代背景。之后, 他在厘清争议中于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译介学》, 推动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路径,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世纪以来, 译介学在面对新的翻译问题和质疑中逐渐发展为由中国学者共同规划的译学理论。如今, *Medio-translat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一书出版, 标志着“译介学”理论开始走向世界, 在国际译学平台上接受同行审视。本文借此契机, 系统梳理了以谢天振为代表的学者对“译介学”的建构历程, 同时以英文版《译介学》一书为例, 评述该书在传播译介学理念的成就与不足, 以期为中国译学理论对外传播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 译介学; 谢天振; 中国译论; 对外传播

The Founding, Contributions, and Going Global of Medio-translatology

— With an Additional Review on *Medio-translat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GENG Jiyong¹, LIU Pengpe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China)

Abstract: Medio-translatology, connecting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s a research paradigm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irst proposed by Xie Tianzhen, the Chinese schola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late 1980s, Professor Xie defended the importance and ownership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China. In the 1990s, while clarifying various controversies about his theories, he published *Yi Jie Xue (Medio-translatology)* promoting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pproac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the new millennium, confronted with emerging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controversies, Xie’s Medio-translatology has turned into a paradigm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 showed their interests in and contributed to the theory. Recently, *Medio-translat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was published, indicating that Xie’s Medio-translatology has to come under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reviews and investigates the trajectory of Medio-translatology. Meanwhile, taking the new book as an example, it also reflects on the achievements and inadequacies of the book in presenting Xie’s

theories, thereby expecting to shed light upon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Key words: Medio-translatology; Xie Tianzhen;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 引言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即掀起一阵海外理论的译介热潮,对本土理论“失语”的担忧与之共生,进而激发了一些学者的中西“对立”意识。彼时,学科边界尚不明晰的翻译界就有人提出“中国翻译理论自成体系”(罗新璋 1984)。这一观点的自证方式是通过系统收集、选编中国中古佛经翻译时期到近代的翻译论述,编纂成《翻译论集》,较早显示我国学者在建构翻译理论上的自觉意识。

这种“对立”意识很快在“中国翻译学”的讨论中为中西译论的“比较”意识所替代,并在中国翻译理论建构方面产生了几种主要认识:第一类,沿袭罗新璋“自成体系”思想,提出从汉语自身特点出发,建构中国译学理论(刘宓庆 1989; 张柏然、姜秋霞 1997),以实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第二类,提倡以西方译学理论框架研究中国翻译现象,吸收并转化为具有普适性的本土译学理论(谭载喜 1988);第三类,对传统译论资源进行现代化诠释并转化成现代译学理论若干范畴(王宏印、刘士聪 2002)。以上几种观点对中国译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存在一定争议和分歧,少数学者对“理论”的认识模糊,忽视了理论的标准和内涵,并受不同翻译观影响,提倡不同理论建构模式。实际上,几十年来中国译学理论研究基本包含以上路径。

新世纪初,西方学界进入“后理论时代”之际,中国译学理论则在经历“学科之争”“特色之争”后,“开始有学科体系自觉”(方梦之 2017: 95),进入理论生产的黄金时代。从千禧年至今二十余年,中国译学界相继产生了包括生态翻译学、大易翻译学以及社会翻译学等在内的翻译理论,不一而足。这些理论因不同内涵与旨归为指导翻译实践和认识翻译活动、现象提供了一定启发,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包括:理论层次上,沟通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间的中层理论不足;理论来源上,基于真问题的原创理论缺乏;话语形态上,缺乏真正意义上融通中外的翻译话语;传播现状上,总体处于“说了传播不开的境地”(方梦之 2017: 95)。

自 2016 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学界对建构和传播中国原创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探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方梦之(2017: 100)率先旗帜鲜明地提出“翻译大国需有自创的译学话语体系”,提出“找出新问题、挖掘新材料、提炼新概念、阐明新理论”作为建构中国特色且国际可接受的译学话语的必经之路。许钧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以下简称《概论》)一书中,提出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以更高的站位和鲜明的立场审视了二三十年来的译学命题,比以往进步之处在于:倡导建构原创性的翻译学理论,同时在话语形态上提倡“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许钧 2018: 11),注重中国译学理论话语进行有效地对外传播和交流。什么样的原创译学理论值得传播、传播什么、如何传播?概言之,除继续采取融通中外的话语外,便是理论生产需有对现实问题的观照,以及在理论的传播过程中,理论生产群体主动把握话语的阐释权。

具言之,译介学的发生、发展到国际传播路径也许能带来些许启示。译介学由谢天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经提出,就走上了系统性的理论建构道路,产生了一定争议,更带来巨大影响,包括创建者本人在内的一众学者对之持续添砖加瓦。《概论》一书对之高度评价,认为其“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对象域,更是对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创新”(许钧 2018: 5)。经过二十多年发展,译介学不再为学者个人所有,是“中国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集体理论贡献”(谢天振 2020: 17)。2022 年,国际知名出版社 Springer 的“翻译研究新前沿”(New Frontiers in Translation Studies)系列丛书出版了《译介学:概

念与应用》(*Medio-translat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以下简称《概念与应用》)一书,标志着译介学开始走向世界。该书由崔峰和李德凤两位与国际译学界联系紧密的知名学者主编,邀请中国译学界和比较文学界的10位学者,从不同角度介绍、梳理和揭示译介学及其核心理论概念产生的背景、观点、争议、影响及应用等,为译介学理论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译学平台上接受同行审视提供了重要契机。有鉴于此,基于该书并结合国内对译介学的系列讨论与研究,本文首先梳理译介学从一般话语到理论体系的建构历程,进一步描写、反思并展望译介学为代表的中国译学理论话语的对外传播方式。

2. 译介学谱系的肇始与形成

谢天振的学术思想谱系揭示了译介学的建构路径。译介学脱生于比较文学媒介学。后者视翻译为文学作品跨文化传播的媒介,视前者为其研究分支。随着国内对西方翻译文化学派的深入接触,以谢天振为代表的比较文学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该学派的翻译思想,用以建构译介学作为独立的翻译研究范式,拓展对翻译工具性的认知,彰显译者主体性与翻译的价值性。

译介学这一话语最早由中国学者提出。从欧洲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到日本学者大塚幸男,将译本和译者等翻译问题纳入到媒介学研究范畴。直到19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兴起,卢康华和孙景尧先后在《比较文学导论》(1984)及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1988)中,首次将文学翻译问题归入属于媒介学的译介学范畴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路径的发轫。彼时的译介学从传统语文学视角介绍中西方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研究方法上倡导对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进行比较,关注误译问题及其背后的复杂原因。“创造性叛逆”首次在中文语境下得到阐释,研究价值得到关注,被认为“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背景等深层接受与影响一系列问题,这都有赖于译介学做深入的研究”(乐黛云 1988: 172)。可见,学界对译介学的认知初具翻译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识,但还停留在话语层面,“对译介学本身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则阐述得不够系统”(查明建 2005: 43)。

谢天振首先推动了译介学从话语到理论的系统建构。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学界在文学评论家陈思和、王晓明的倡导下,掀起“重写文学史”的大讨论,并在《上海文论》设立专栏,反思和突破过往包括意识形态导向在内的文学史的书写路径和框架,探索文学史书写和研究的多元可能性。谢天振受邀写下《为“弃儿”找归宿——论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提出“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他吸收了俄国学者关于“翻译文学应当作为每个民族文学的组成要素来研究”(谢天振 1989: 60)这一观念,兼顾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关注翻译文学的实际,呼吁重视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语境由《概念与应用》收录的“The Chinese Context and Significance of Medio-translatology”一文从发生学视角做出回顾,指出“谢天振的译介学理论是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事件为直接发生契机”(Cui & Li 2022: 44)。这次大讨论中,“创造性叛逆”和“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成为书写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依据。

谢天振在论证翻译文学国别归属基础上,以《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1998)一文开启了对翻译文学史书写与研究的系统思考,标志着译介学初具理论的体系性。1980年代以前,少有以“翻译文学史”为题的文学史专题著作。谢天振通过对史料挖掘爬梳,发现阿英的《翻译史话》和1950年代北京大学学生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是少有的翻译文学史性质的专题史,并首次从两部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方式中,提炼出书写这一历史的基本构成要素:“作家(包括翻译家)、作品(包括人物形象)和事件(不仅是文学翻译事件,还有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读者对翻译文学的接受事件)”(谢天振 1998: 13)。需要指出的是,译介学作为理论的体系性得以完整显现:翻

译文学史的书写理据首先在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其次是由于翻译文学是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在具体实践上则融入了文学史书写的一般方法(关注作家、作品和事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关注传播、接受与影响)。因而,“翻译文学史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一是它的文学史性质,二是它的比较文学性质”(谢天振 2013: 13)。

诞生于 1990 年代末的首部《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转向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互通范式。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比较文学界在影响和平行两大传统研究方法之后的文化转向,造成对各种文化理论的过度征用,使文本沦为工具,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理论危机。同时期的文化转向却推动翻译研究突破语言学范式和传统忠实观,从对象和方法上拓宽了研究边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出身的谢天振对这两大潮流持续关注,在对翻译文学史的持续思考中,将文化转向理念一并融入译介学,使之从传统比较文学媒介学中分离而出,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谢天振 1999: 2)。

谢天振的译介学非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使用范围亦不限于该学科。在《概念与应用》中,“Medio-translatology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和“The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s: Medio-translatology as a Paradigm”介绍了译介学诞生的学科背景,提到国内对翻译的认识限于文本中心主义的经验谈积重难返,但对彼时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境遇观照不足,故而将译介学的贡献仅局限于翻译学领域。实际上,谢天振结合西方学界的两大转向,对翻译文学史书写和研究的理论探索同时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和翻译研究的方法论,是建构译介学的重要论题。其中,翻译文学的认识论架起了以上学科沟通的桥梁:对于比较文学而言,翻译文学产品和历史的探索丰富了比较文学(译介学)学科理论资源,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新疆域”(江帆 2021: 122);对翻译而言,“译介学的意义主要确实不是在指导翻译实践上,而是在文化和文学层面”(谢天振 1999: 21),即为认识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对跨国文学、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

3. 译介学的学理拓展与建构

首部《译介学》理论著作诞生以来,几乎每个理论概念都遭质疑并获进一步发展。尽管改革开放催生了理论引介的热潮,但并非所有学者都敏锐捕捉到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加之学科细化使个体认知有所局限,21 世纪初,作为两大转向产物的“译介学”获得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比以往面临更多质疑与争议。当然,理论本身的内在缺陷也不可忽视,这就决定了译介学理论有待进一步厘清与拓展。不过,新世纪以来,除理论提出者本人继续完善原有理论之外,一众学者参与到对译介学的完善。概言之,无论质疑还是支持,都是译介学前进的动力,是这一理论从个体建构到集体建构转变的重要标志。

首当其冲的便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比较文学媒介学中,提及这一观点,恐怕少有比较文学学者对之质疑。虽然埃斯卡皮仅用简短一段话抛出了这一观点,但经过不断传播与阐释,以读者和接受语境为主体的内涵在谢天振等比较文学学者的阐释改造下,“‘通常以为’的‘创造性叛逆’的主体竟已变成了译者”(梁新军 2022: 99),或者说突显了拥有译者身份的读者群体。前文可以看到,谢天振对这一观点的重构与阐释是为译者的主体性、翻译文学(史)的价值提供理论支持。但在“误读”以后,引来更多“误读”。“‘Creative Treason’ as a Key to Medio-translatology: Circulation and Controversies”一文便借用赛义德的“理论旅行”为分析框架,描写了这一概念如何从跨文化、跨文学交流的本质被“误读”为文学翻译的本质,并进一步在中国语境下“误读”为一种“翻译规范”。也许是谢天振对这一翻译本质赋予了更多的描写性内涵,将翻译文学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与无意两种,并进一步划分为“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2013: 2),

引来学者从价值层面对这一“规范”进行批判。同时,在事实层面,一些学者在应用层面将之突破了文学翻译的讨论范畴且“视其作为一种翻译方法而非翻译的本质”(Cui & Li 2022: 87)。然而,自《译介学》出版以来,谢天振已经多次重申创造性叛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翻译的方法和手段”(2012: 34),“不是一种价值观,也不是一种立场”(2019: 7)。

实际上,为强化其为研究以及书写中国翻译文学史提供理论支撑,谢天振又整合了更多理论,强化对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认识。在《译介学导论》(2007)中,他从“解释学”“解构主义”以及“多元系统论”等多角度揭示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历史性以及译者的主体性。这些角度所揭示的翻译本质均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不谋而合,增加了认识与定义翻译的维度。当然,出于谨慎的学术态度,作者不忘强调“解构主义等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翻译研究……并不是要否定原文和原作者,而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原文和译文的关系”(谢天振 2007: 195)。

尽管创造性叛逆等理论揭示了译者、译作区别于作家、原作的独特价值,但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问题有待进一步明晰。早在 20 世纪末谢天振提出翻译文学当属国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得到贾植芳和施蛰存等文学和翻译名宿的认同,并在文学史编撰中为翻译文学留下一席之地。但也被质疑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把汉译外国文学说成是中国文学”(王树荣 1995: 13)。对此,谢天振(1995)从文学翻译的审美把握、创造性、对接受语境产生的影响以及译者国别归属等方面,强调翻译文学与原作的差异,论证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介学》一书又从文学翻译行为本身、媒介者、接受者以及接受环境等多个维度进一步阐释“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为国别归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翻译活动的变化,以译者国别归属作为翻译文学归属的一个判定条件受到挑战。其中,在一次与谢天振的对话中,宋炳辉提出外译实践中的译者国别归属与译作期待受众之间的悖反、数量增多的流散译者群体或无国籍、多重国籍译者等现象为这一区分标准带来的挑战。谢天振认为当下“国别归属”判定法主要是针对历史上以译入为主的文学翻译活动,而对于将来翻译文学归属判定,“很值得进一步去探讨”(谢天振、宋炳辉 2008: 44)。此外,若继续以译者国别归属作为第一判定标准,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还需进一步纳入中国译者译出的著作。在这方面,岳峰的《中华文献外译与西传研究》(2018)、王建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的出版与传播》(2021)分别梳理了中国古籍和当代文学的整体对外译介历程。下一步便是借鉴翻译文学史的写法,将译出文学和译入文学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中国翻译文学通史。

最后,谢天振等一直致力于厘清译介学的学科归属和研究界限。从首部《译介学》到《译介学导论》(2007)、《译介学(增订本)》(2013)及《译介学概论》(2020),作者一直强调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或从比较文学立场开展的翻译研究(1999: 2; 2007: 6; 2013: 2; 2020: 30),它不同于传统翻译研究——关注三类翻译技巧、传统翻译理论、文学翻译史(1999: 9),更是文化转向下的一般翻译研究,没有翻译学那么大的研究范畴。正如“创造性叛逆”受到误解一样,由于不了解译介学是一个包含对象域和方法论域的集合体,有研究者将其简单视为能够指导翻译实践或译文研究。以“翻译”和“译介学”为主题在知网检索,可以看到类似“译介学视角下的某某翻译策略研究”或“译介学指导下的某某研究”。把译介学这样的宏观研究理念而非其具体的概念、对象和方法套用在单个文本的研究上,实质上是不理解什么是以及如何用译介学。

在谢天振以外,查明建对译介学落到实处且从理论上拓展最多,“功不可没……需要另文论述”(赵稀方 2021: 46)。除在翻译文学史编撰上着力颇多外,他在《译介学: 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2005)一文中,从理论层面接力并探讨了翻译文学的研究原则与方法,进一步归纳了译介学的其它 9 大研究范畴和方法,值得关注。此外,在《概念和应用》中,他的“Comparative Literatur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再次重申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即译介学的学科归属、立场和方法,指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就是翻译文学研究”(Cui & Li 2022: 53),并进一步整合西方文化翻译理论,夯实了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文化翻译)系统理论‘停止’的开始”(同上: 61)。同时,该文引入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理念,解构了翻译文学作为原文化的产物这一传统理念,为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问题强化了理论支持。

4. 译介学理念的应用与实践

20世纪90年代,谢天振在重写文学史大潮中呼吁和探索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问题,有力推动了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也是对既有翻译史书写路径的有益补充。“翻译史的研究一般包含以史料梳理为主的通史研究,以及以特定问题为导向的个案研究。”(耿纪永、刘朋朋 2021: 103)自重写翻译史提出以来,翻译文学史书写同样囊括了通史和各类个案史。前者为后者提供线索,后者成为前者的基本单位,因而从研究广度和深度讲,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译介学的初心“主要是要解决翻译文学的地位及其归属问题”(谢天振 2020: 12),当下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成就则体现了不忘初心。首先,从数量上看,继谢天振呼唤为“弃儿”寻找归宿后,出现越来越多以翻译文学史为题的大部头著作,较为知名的包括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7)、谢天振、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2003)、孟昭毅、李载道的《中国翻译文学史》(2005)、杨义等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2009)、王友贵的《20世纪下半叶中国翻译文学史: 1949—1977》(2015)等。以上翻译文学史各有特色、相互补充,一个基本共识便是突出译者的贡献且不同程度涉及翻译文学史书写的基本要素,但也存在一个无可避免的瑕疵——难以真正顾及并深入接受和影响层面的研究。即便有,也是从宏观把握而非从个案细致入微论述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文化以及社会层面产生的影响。当然,也须承认这类著作主要在于描绘中国翻译文学的轮廓,为个案的深入提供线索,也并非所有翻译文学作品、译者、社团都产生了影响。鉴于接受和影响研究存在难度,便有待个案深入,与通史相得益彰。此外,如具国别区域史性质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王向远 2001)和译者地域归属性质的《浙江翻译文学史》(吴笛 2008),均属中观层次翻译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对通史局部有所深化。

从视角和方法角度而言,个案最能体现译介学理念的独到之处。如结合包括“多元系统”“操纵”“改写”在内的文化翻译理论,多角度透视单部作品、单个作家的译介历程或某一团体、刊物对翻译文学的选择和翻译过程。这类研究同样不在少数,如耿强的《中国文学: 新时期的译介与传播——〈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2019)、崔峰的《翻译、文学与政治: 以〈世界文学〉为例(1953—1966)》(2019)等。值得一提的是,真正较为深入论述翻译文学与创作的关系当属宋炳辉的《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以作家为中心》(2013)。该书不仅宏观上论述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语言和文学的建构作用,还以多个个案考察了近代以来翻译和创作并存且相互影响的作家群体,以翔实史实充分论述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

《译介学》的理念同样体现在《概念与应用》的“Case Studies”(个案研究)部分。选文分别透视了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林纾、严复等译者的文学翻译活动,方法论上融入创造性叛逆等翻译文学史的书写理念,并结合了操纵、改写等理论视点。“‘Creative Treason’ as Meaning Prod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Tunnels in Lin Shu’s Translation”和“Understanding Lu Xun: A Cultural Probe into Lu Xun’s ‘Hard Translation’”通过翻译副文本揭示“创造性叛逆”的存在。根据《译介学》,译者创造性叛逆在文本内部有具体表现形式,“The Chinese Montesquieu in Yan Fu’s Translation of *The Spirit of Laws*”进一步强化了文本层面的对比分析,体现译文对原文内容的“背离”,观照了译者动

机。翻译文学史书写重视接受与影响,“Translation of Charles Baudelaire in China from 1949 to 1976”揭示了陈敬容《恶之花》译本对原本的改写及对中国诗坛朦胧派的诞生与创作产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文学翻译都能轻易归为创造性叛逆。特别在翻译文学史研究中,创造性叛逆现象的先决条件在于变形译本对接受语境产生了影响,即译文与接受语境具有比较文学的研究价值。否则,所谓的翻译文学研究就沦为了一般的文学翻译史研究,在翻译作品的梳理上可做到细大无遗。翻译文学史则是以文学翻译史为基础,是对之的一种升华,“……分析、探讨 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建构意义,就有必要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发展史作比较细致的梳理,揭示不同时期文学翻译发展的特征”(查明建、谢天振 2007: 3)。因而,作为翻译文学史的个案展示还可进一步体现比较文学性质,在译文的接受和影响层面发微,以充分展示译介学理念的应用价值,为国际同行真正提供有效启发。

5. 中国译学话语对外传播的反思与展望

从“中国翻译理论自成体系”到建设“融通中外的翻译话语体系”,学者们意识到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建构,核心在于思想的交流互鉴。为此,一方面,学界在清理传统译论的基础上,致力于论证、显化以及建构已有潜在的中国译论,使其在话语形态上向现代化方向迈进。另一方面,从现实问题出发建构译学理论成为另一路径。如今,中国译学理论正加大步伐,迈向国际舞台。

不容置疑,当下中国译论的海外传播现状仍不尽如人意。有学者通过考察与对比中国翻译理论在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的传播现状,发现“中国翻译理论的国内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差异显著”(韩子满、钱虹 2021: 105)。就理论性著作而言,国际出版社推出的“翻译研究新前沿”已向国际学界推出的原创性较高、特色相对鲜明的中国译论专著有 *Eco-Translatology*(2020), *Varia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2020)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数译论在创建过程中用汉语表述,翻译在当下中国译论著作的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此,我们以《概念与应用》为例,指出现阶段对外传播中国译论的进步空间。就该书而言,译介学的名与实在对外传播中还需进一步厘清。首先,该书收集的 10 篇文章中,在“译介学”的英文术语使用上,大都“名从主人”,选用“Medio-translatology”一词。不过,该词能否真正代表这一学说的内涵,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毕竟,学说创始人谢天振也认为这一英文表述并不能精确、全面反映其译介学思想以及其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的发展与变化,只是“勉强可以表达译介学的意思”(谢天振 1999: 2)。有鉴于此,查明建在《概念与应用》中则直接称之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明确其所属学科和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定位。虽然这种理解贴切谢天振本人对译介学的当下定位,但是否符合译介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还需做进一步考察。

其实,“译介学”一直处于发展之中。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译介学随着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的出现,早已脱离对媒介学乃至比较文学的归属,同时被视为“21 世纪中国翻译学者在中国建构的三大理论之一”(Cui & Li 2022: 1)。早在 2012 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国内兴起了对文化外译的讨论。谢天振发表的系列文章探讨了文化译介的模式、理念,首次区分“译入”和“译出”的差异、规律及成因,并在《译介学概论》(2020)中将外译思想纳入到“译介学”体系。与此同时,前文可见诸如查明建和宋炳辉等人的论述,不断夯实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

相较其它,“Yijie Xue or Transcreation Studies: A Chines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一文首先从题目上否认了“Medio-translatology”这一术语,尝试以音译或重新命名方式来体现译介学与西方翻译研究的差异。毕竟,原话语表达的是一种翻译研究的科学性立场,而研究对象“翻译文学”以及“创造性叛逆”等理论基点均体现翻译研究的人文性。此外,该文尝试论证具有中国立场

的“翻译文学”。何绍斌从术语上严格区分 translational literature 和 translated literature, 认为后者是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中的概念, 具有“演绎性”, 而前者具有“归纳性”(Cui & Li 2022: 69), 背后不仅有“创造性叛逆”理论的支持, 更有对“重写文学史”的时代语境关怀。这是避免西方读者将“译介学”及其重要研究对象“翻译文学”简单“格义”为文化翻译理论等西方学术思想、理论概念的一种有益尝试。

当然, 该书并非“译介学”原著, 而是以论文集形式评述译介学及展示相关理念的应用, 自然少不了征引原文。对于同一片段的征引, 我们以为在译文形式上至少当保证一致。但从选文中两处对“译介学”定义的征用看来(页 16 和页 18), 虽意思大体一致, 但文字表述上还是略有差异。同时, 个别地方在引用其他学者观点时, 漏标了具体出处(如页 42)。此外, 不少选文都介绍了谢天振的学术创作, 却在译名上有微细差别, 特别在介词使用上。如《论文学的创造性叛逆》分别被译为“on creative treas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16)和“on creative treas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82), 是指文学翻译中的一种现象, 还是特有现象? 对个别龃龉之处, 期待原著的译介, 以示“译介学”原貌。

6. 结语

从基于问题、提出概念、厘清争议、拓展概念到体系建构, 再到走向国际, 译介学所经历的过程也是其他中国译论所经历或需经历的过程, 因为这是个体研究理念成长为具有共同体特征的范式的重要标志。如今, 译介学能走向国际并由创建者之外的一众学者为之推介, 本身也反映了这一学说在国内的接受基础。单从话语本身而言, “译介”已然深入人心, 从论文选题到项目申报, 出现在各种场合下、表述中。当下, 国内“原创”理论众多, 具有良好接受基础与传播条件的较少。理论建构本非一蹴而就, 面对问题和质疑, 既离不开提出者本人的持续思考与完善, 也离不开包括质疑者与接受者的关注与应用, 以此为基础, 聚众之力, 才能为中国译论的国际化提供有力内部支持。中国译学理论对外传播已提上日程。多少译论能够真正走出去并获得认可, 除了理论的建构方式和原则是否能够为人所接受与理解之外, 在传播过程中涉及的问题与策略, 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特别是邀请国际同行参与评论, 或许能增益中国译论的传播效度。

参考文献:

- [1] Cui, Feng & Defeng Li (eds.). *Medio-translat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C]. Singapore: Springer, 2022.
- [2] 方梦之. 翻译大国需有自创的译学话语体系[J]. 中国外语, 2017, (5): 93-100.
- [3] 耿纪永, 刘朋朋. 翻译文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识——兼评《翻译、文学与政治: 以〈世界文学〉为例(1953—1966)》[J]. 中国比较文学, 2021, (1): 95-107.
- [4] 韩子满, 钱虹.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国际传播: 现状与展望[J]. 中国翻译, 2021, (6): 103-110.
- [5] 江帆. 译介学研究: 令人服膺的中国声音——从学科史视角重读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集[J]. 中国比较文学, 2021, (4): 116-129.
- [6] 梁新军. “创造性叛逆”的跨国旅行与内涵变迁——对比较文学译介学一个经典术语的考察[J]. 外国语, 2022, (1): 95-102.
- [7] 刘宓庆. 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J]. 中国翻译, 1989, (1): 12-16.
- [8] 罗新璋. 翻译论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9] 谭载喜. 试论翻译学[J]. 外国语, 1988, (3): 24-29.
- [10] 王宏印, 刘士聪.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作为建立翻译学的一种努力[J]. 中国翻译, 2002, (2): 7-9.
- [11] 王树荣. 汉译外国作品是“中国文学”吗?——试与贾植芳、施蛰存先生商榷[J]. 书城, 1995, (2): 12-13.

- [12] 王向远. 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3] 吴笛. 浙江翻译文学史 [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8.
- [14] 谢天振. 为“弃儿”找归宿——论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J]. 上海文论, 1989, (6): 58-62.
- [15] 谢天振. 翻译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 与王树荣先生商榷 [J]. 书城, 1995, (4): 25-27.
- [16] 谢天振. 中国翻译文学史: 实践与理论 [J]. 中国比较文学, 1998, (2): 1-19.
- [17] 谢天振. 译介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18] 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9] 谢天振. 翻译文学史: 探索与实践——对新世纪以来国内翻译文学史著述的阅读与思考 [J]. 东方翻译, 2013, (4): 9-13.
- [20] 谢天振. 译介学 (增订本)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 [21] 谢天振. “创造性叛逆”: 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 [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9, (2): 4-13.
- [22] 谢天振. 译介学概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23] 谢天振, 宋炳辉. 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关于译介学研究的对话 [J]. 渤海大学学报, 2008, (2): 39-46.
- [24] 许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 1978—2018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8.
- [25] 乐黛云. 中西比较文学教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 [26] 查明建. 译介学: 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 中国比较文学, 2005, (1): 45-67.
- [27] 查明建, 谢天振. 中国 20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 [28] 张柏然, 姜秋霞. 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 [J]. 中国翻译, 1997, (2): 7-9.
- [29] 赵稀方. 重写翻译史 [J]. 中国比较文学, 2021, (2): 31-3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 20 世纪欧美现代主义诗歌译介史论”(17FWW005)

收稿日期: 2023-0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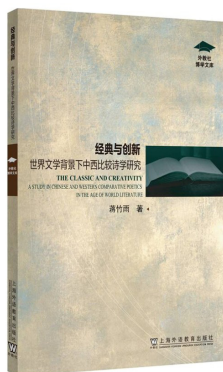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耿纪永(1974—),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翻译学。

刘朋朋(1994—), 男, 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 翻译学。

《经典与创新: 世界文学背景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作者: 蒋竹雨 著 出版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定价: 30.00 元 ISBN: 978-7-5446-7886-5



本书为“外教社博学文库”之一, 将中西文学批评中有关经典与创新辩证关系的探讨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维度的理论追溯与梳理, 呈现这一理论主题在中西文学批评中的互动与发展脉络; 总结现代以来经典文学作品在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并以改编与脚注为具体研究案例与研究对象, 探讨多元个性在阐释与传播经典中的新角度与新方法及其合理性。本书脉络清晰, 文笔流畅, 对于英美文学、比较文学方向师生和研究者以及其他感兴趣的读者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